

焦
点



对
话

下

张勤德\著

JIAO

DIANDUIHUA

大众文艺出版社

焦

点

对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下

张勤德\著

JIAO

DIANDUIHUA

大众文艺出版社

怎样切实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三大问题”

——一些干部、群众的对策建议

由于当前我国处于关键时期,摆在面前的问题确实不少,有些还相当尖锐、复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些问题非常关心,并对如何加以解决进行着思考、议论。这里综述的,是笔者几年来在各地调查时直接听到和在有关材料上看到的一些干部、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对策建议。

腐败严重、治安恶化、分配不公这“三大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三个老大难”,要切实地尽快地解决,必须从多方面努力。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尤其应当重视以下几点:

(一)必须把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作为最关注的事情。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其他各项工作的目的。因此,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題,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破除的最大错误认识,是认为解决“三大问题”会影响改革和经济建设,尤其是怕带来不稳定。实际上,既然解决“三大问题”是民心所向,党心军心所向,因而从根本上说,

便不仅不会影响稳定,而恰恰是稳定的最可靠保证。这是因为,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对政府的信任,是我们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支柱。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腐败对人们心态的影响比任何社会都更加强烈和直接。经济学家黄苇町在《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一书中写道:“经过中国共产党 70 多年的身体力行和建国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人民公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习惯的、最基本、最广泛的政治行为方式,特别是长期的突出政治的宣传教育,使这一思维模式与苏联相比,更为深入人心。因此,人们对任何腐败现象的出现都会很敏感,会更加不能容忍,而腐败的蔓延将直接导致人心的涣散、信任的丧失、理想和信念的崩溃。腐败的蔓延甚至会导致政治剧变。而一旦唯一能够保证国家稳定和统一的主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消失,国家将出现巨大的政治真空,甚至长期动乱的局面。而当理想和信念崩溃,社会精神道德的堕落,文化的颓废,人欲、物欲的横流,将危及整个民族发展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社会稳定?五十年代“三大问题”解决得好,那时不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社会最稳定的时期吗?

(二)必须下决心打掉“三大问题”的保护伞。“三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在于有右的势力的保护和支。当然,那些腐败分子、犯罪分子、非法暴富者,从整体上说,也属于右的势力。这种势力的代理人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成为解决“三大问题”的最大阻力。然而,他们虽然表面上不可一世,并且常常以思想最解放、改革最积极的面目骗人,但实质上则很虚弱,是一批小纸老虎。

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极少数人，而危害的是绝大多数人。我们应当认清，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谁胆敢阻挠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谁就注定没有好下场。而对那些实实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人民群众是会真心拥护的，是决不会忘记的。

（三）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腐败严重、治安恶化、分配不公长期解决不了，占便宜的是极少数人，吃亏的则是既无权又少钱的广大劳动群众。所以，人民群众对腐败等现象最痛恨，要求解决问题的愿望最强烈，同“三大问题”的保护伞斗争最坚决。我们要真想解决“三大问题”，就要真的敢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动群众帮助我们进行一次以反对不正之风，继承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否则，那是难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脱离群众，一事无成；依靠群众，无往不胜。这一条，在解决“三大问题”中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如何全面、正确、积极地搞好改革开放？

——一些干部、群众的对策建议

这里综述的，是几年来笔者在调查中听到和在材料上看到的一些干部群众对这个问题的对策建议。他们认为：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观。对于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事实上是有不同观点的。例如，从一些人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标准，从而搞乱了社会主义问题来看，从他们对人对事对历史和现实采取双重标准来看，从他们把“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叫做思想大解放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而是以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唯一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从一些人极力为个人主义正名，极力推行一切向钱看那一套东西，极力搞“资本主义补课论”来看，他们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路线；从一些人大搞“精英政治”、“精英治厂”那一套，而根本不相信、不依靠、不关心广大工农兵群众来看，他们主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路线，而不是奴隶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所以，假如按照这些人

的思想路线搞改革，势必会使社会主义改革逐步地演变为私有化改革、补资本主义课的改革或者叫做改“姓”。这就说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观，或者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上，坚持正确的观点，是多么重要。

其次，要全面、深入地认清改革的目的。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只有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因此，只讲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目的，不讲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不全面的。

还要看到，发展生产力也不是没有目的的，否则，那不就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了吗？它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全面需要，或者说，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使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我们在讲改革的目的时，不能不讲这一最终目的。这样，才谈得上全面、深入地认清改革的目的。

这一目的体系，必然要求我们通过在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上的改革创新，来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要求我们既要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又要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任务。那种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就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改革本质特征，背离改革的目的任务的。

再次，要准确把握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本质、目的、任务，都决定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改革的对象加以革除，也决定我们不能用私有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可是，不少

的论者却在宣传“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宣传用私营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里仅举一例：

有位同志说：“在一次有关乡镇企业的研讨会的最后一个下午，一位年轻教授亮出自己的观点，问：公有制好在哪里？谁是公有制的受益者？公有制能否找到好的实现形式？有没有成功先例（个别的有，整体有没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了，还有没有能与市场相结合的公有制？会后有人说：这是把一层纸捅破了！”

“一位年轻的刊物编辑发言，认为群众心理不平衡，看到企业不行，不想把它搞好，甚至希望倒掉，是因为只有少数人得好处。他的结论是缺乏反腐败机制，没有一心为公的企业家，改来改去都不解决问题，只能走私有化道路。有人说：这又是捅破了一层纸。”

这些事实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人是把公有制当作改革对象，把私有制当作完善和发展的对象呢？

最后，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主力军。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革命阶级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更是这样。有些人尽管口头上也讲几句依靠群众，但实际上主张的是“精英治厂”、“精英治国”。这一点，从大量事实中都可以看出来。例如，这些人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我们党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三大问题”，也和这一点有关系。这样搞，自然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受到损害。当然，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我们也要注意教育群众不要让眼前的蝇头小利迷住自己的眼睛，从而看不到滑向资本主义万丈深渊的危

险。看不到这一危险,是最危险的啊!

还有,要充分重视检验改革的标准。一些人为了推行“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那一套,常常把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依据。我们知道,“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改革得失、衡量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标准,并不能用来直接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即区分姓“社”姓“资”。最明显的例子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有利的,但再有利,香港实行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可见,检验社会主义制度,不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作标准是不行的。在这里,四个坚持实际上成了检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标准。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四个坚持自然也成为区分两种改革观,或者说区分改革开放和和平演变的标准。

从这里不难看出,标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搞清这个问题,不仅会把改革搞乱,而且会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搞乱。所以,我们务必要加以重视。

一个易被轻视的重要问题

—

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是多方面入手、多种手段并用的。他们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在政治上搞多党制,而且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对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和平演变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但也不可轻视经济上的和平演变。这主要是因为:

(一)它的欺骗性很大。由于全国上下要求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愿望非常强烈,我们又正确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由于不仅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等多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方国家现在在经济技术方面仍占明显的优势;由于搞“私有化潜行”尽管从长远和全局来说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但在短期内或局部地区却有可能使经济发展较快,因而,打着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旗号推行的逐步向私有化潜行的主张往往比政治上的多党制和指导思想的多元

化,更能骗人。这一点,从一个时期里相当一部分人竟幼稚地相信了关于资本主义是靠制度合理、经营有方、勤劳致富发展起来的那个曾被马克思最尖锐地揭露过的“鲁宾逊”神话;相信子私有制才最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内在积极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最能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和活力的论调;相信了西方国家是实心实意要帮助中国的“蓝蚂蚁”(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称号)富裕起来的“天使”,于是头脑里装进了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弊端的空想蓝图,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则几乎只注意弊端而不注意它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作用上,便不难看出来。

(二)它的影响面很广。由于物质利益是人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利益;由于我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私有观念具有特别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前一段时间“一切向钱看”的人或单位、地方钻政策的空子占到了便宜,因而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话,那么用“经济实用主义”(“只要能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就是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第15页所表述的“经济实用主义”的一种反映)观点解释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主义”即“新社会主义观”思潮,则不仅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而且在工人、农民和干部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不难从“工农兵学党(指某些党政机关),一齐来经商”现象的出现上,从“一切向钱看”现象相当广泛地存在上,从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严重程度上,从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巨大政治优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发生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十年最大的失误”上看起来。

(三)它的影响度很深。思想上的和平演变,的确往往是先导;政治上的和平演变,也确实具有关键性。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经济上的和平演变,毕竟是根本性的演变,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力。经济上的和平演变不仅作为手段具有决定性,就是作为目的,它也是带根本性的。西方搞和平演变的目的,当然是要把我国变成他们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以求更便于进行剥削和掠夺。这一点,国内外的敌对势力都是说得很清楚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1年5月27日发表文章说:“中国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希望显然在于经济继续发展。”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经济贸易,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交流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主要途径,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中国出现的进步事态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们看到并促成中国涌现出新一代的企业家、经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消费者,他们抱有的期望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遏制不了的。正是这些改革的力量产生了去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那种压力,甚至现在那种压力仍然有增无减。《纽约时报》1991年11月15日发表文章,提出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建立“牢不可破的经济共生关系”,“使共产党在经济变质中解体”。一位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我倒希望能看到重新出现几百万个‘资本家’(企业家)。台湾的民主改革难以逆转就在于有几十万个资本家这样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基础。”(引自《求是》1990年第4期第6页)

即使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它突出强调政治民主、公开性和抽象人道主义,而忽视它主张搞“混合经济”,把

“经济实用主义”作为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我们知道,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针对“停滞时期”,提出的是加速发展战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而在政治上搞起了公开性和民主化。当然,民主化使抽象人道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进一步得以泛滥;但是,它们的进一步泛滥又推动了民主化。这样逐步发展,终于相当广泛、普遍地造成了“不管哪个党上台,实行什么主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的社会心态,给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尼克松 1985 年考察东欧以后说:“东欧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果然,不幸被他言中了。如果我们对“经济实用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经济根源缺乏了解,那是难以把它看透、驳倒的。

很大的欺骗性、很广的影响面、很深的影响度,必然使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从下面这样一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某县在反腐败中发现县里相当一部分干部有腐败问题。但一整又使县里的经济工作受到了影响。于是,为了使经济工作能上去,只得使反腐败斗争受影响了。

正因为这样,西方格外重视对我国实行经济上的和平演变,他们往往把这称之为“最有力的武器”、“最好的投资”、“最能影响中国行为的政策”。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1989 年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在经济上又诱又压的表演,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正因为这样,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也很注意从经济上打开和平演变的缺口。不过在 1989 年之后,他们不得不多加一层保

护色,变成了“私有化潜行”罢了。

前些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屡遭挫折,一些同志不抓反自由化斗争的最大借口,就是说反自由化会影响西方人和我国的经济交往,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他们对自由化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迁就得最多的就是经济上的自由化。有的同志不是提出过:“经济领域里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由此可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思想上、政治上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又不可忽视经济上的和平演变的危险性。看不到危险,显然是很危险的。

二

影响我们进行反对经济和平演变斗争的错误观点,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就其中三个观点的错误作一初步分析。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和是非的根本标准,那么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都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没有必要去问什么“姓社姓资”。

在当代,社会主义是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本身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特征,也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标志。现在西方国家的生产力,确实也在发展;在发生和平演变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的经济也不是没有发展或者在几年后也很可能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唯一标准,显然会得出错误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等的整体。因此,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标准,也是包括生产力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等等在内的整体。坚持这样一个整体标准或者说坚持实践标准的整体,就会不仅看到西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本国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之上,严重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以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会看到它政治上的反动、道德上的堕落、精神上的空虚,即看到它的腐败、贪婪和不公正,看到它剥削、压迫、侵略的罪恶本质。这样,就会认识到,“既然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把经济搞上去,既然西方国家已经把经济搞上去了,那么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我们也可以像西方那样干”所主张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不是改革而是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内乱甚至内战之中,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回答“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之后,生产力将像印度等国那样发展,是否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问题,能不能说是应当的呢?也不能。因为这样做不仅将使生产力不能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那样快地发展,而且会造成两极分化,使大多数人民群众遭受剥削,使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劳动者头上,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这样,显然只有利于极少数剥削者而不利于广大劳动者,人民群众是决不会让这种倒行逆施得逞的。毛泽东同

志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是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页）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9页）社会主义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运动。只有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果不管是否造成两极分化，是否给人民带来痛苦，而把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本身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那显然会造成混乱。对这一点，下面一段话是会从反面给我们一点启示的。《乱开药方很危险——北京“改革十年”研讨会侧记》一文写道：“在部分代表中间产生出一种倾向，就是寻找更激烈的解决方案。一是全面私有化（当然在表述时，因着政治考虑，不敢公开提出私有化，而是把概念扭曲来间接提议，例如一代表先把社会主义目标抽象化起来，定为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愉快，因此这样的目标与全面私有化并不矛盾，也因此全面私有化便是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转引自《学习·研究·参考》1990年第5期第37页）

认为搞改革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这种观点是违背改革本质要求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和要求改革只有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就是说，必须把有利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任务、检验标准；必须认

识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坚持正确的改革观,才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显然,这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目的、任务、检验标准并不矛盾,因为它是以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而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四个坚持,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巩固、完善和发展它,即不断地进行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说,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的结合点。离开这个结合点谈改革,就容易导致把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甚至“不问姓社姓资”;离开这个结合点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容易滑向真正的僵化、保守、教条主义。可见,认为搞改革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根本否认了这种结合点,它所主张的,说到底是可以不问“搞社搞资”,不问改革“演变”。不纠正这种观点,无疑不仅谈不上反和平演变,还会给这种演变大开方便之门。

有的同志说,只要经济上去了,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由化就不会有什么市场,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波。这样,反和平演变就有了充分保证。

经济发展快,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确实有利于反和平演变。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便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自由化的市场会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小。在1989年之前的10年间,自由化市场为什么呈现出越来越扩大的总趋势,直至酿成动乱暴乱?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经济最困难,自由化也